

## 近代北京基督教史研究现状及史料利用综述<sup>①</sup>

左芙蓉

基督教与近代北京的关系约始于 19 世纪中期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进京，传入北京的基督教亲历了历史变迁并且在其中异常活跃。近代北京基督教史既反映了基督教在近代北京发展历程的曲折，又展现了基督教与近代北京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还揭示出近代北京基督教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引起教内外人士的关注和学者的兴趣。

### 一、中外人士对近代北京基督教史研究的不懈努力

#### 1. 国外主要相关研究

从笔者掌握的信息看，国外有关近代北京基督教史的专门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上个世纪 50 年代出版的《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一书是早期代表作之一。该书由艾德敷(Dwight W. Edwards)<sup>②</sup>编著，有许多人参与了该书的写作，书中详细论述了燕京大学从筹建、成立到发展以及抗战后期一度停办、战后复校再到最终停办的历程。参与该书编写的人多有近代来华传教的经历，有的人甚至亲历了燕京大学的创办和发展。因此，书中提供的资料比较直接，所述事件具有较大的真实性，此为该书的特点之一。将燕京大学的历史置于中国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之中加以考察，比较全面地再现了该教会大学在一个动荡环境中的发展及其与中国社会变迁的互动，此为该书的特点之二。但作者很强调中国基督教教会大学的正面影响，绝少提及负面的社会效应，艾德敷甚至称燕京大学不只是一所高等学校，而且是一种精神力量<sup>③</sup>，充分体现了作者的传教士立场。尽管如此，该书仍不失为研究近代北京基督教史以及近代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活动的一部重要参考文献。关注燕京大学的还有美国学者韦斯特(Philip West)，1976 年出版的《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是其力作。该书深入分析了基督教在民国北京开办高等教育及其对中西关系的影响，指出燕京大学既成功又失败，成功之处在于它是植根于新教传教事业和中国土壤里的世界主义理想的实现，曾经具有很高的学术地位。“如果说 20 世纪曾有超越东西文化差异的事情，那应该就是燕京大学”；失败之处既反映在它的易受攻击又反映在它后来的完全停办，“首先是来自西方宗教的原教旨主义的攻击，更为严重的是来自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抨击，最后是来自韩战时期国际政治的影响”。韦斯特认为，“1949 年以后俄国在中国政治中的影响与燕京大学的关闭是有关系的。美国与中国的联系在与日本的战争中得到加强。但是在战后，学生开始憎恨美国支持蒋介石，司徒雷登个人对蒋的忠诚以及他作为支持国民政府的美国大使，都影响了燕京大学所谓的事业”。尽管韦斯特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以及韩战都成为燕大继续存在的不可克服的障碍，但他更强调“外交是燕京大学结束的决定性因素”，所以，“使燕大结束的政治力量可以说是既有中国的又有西方的”<sup>④</sup>。不可否认，韦斯特对燕京大学的兴亡及其原因的分析有其独到之处，与艾德敷将燕京大学历史的终结主要归因于共产主义在华的胜利相比，韦斯特的视角更宽广更开阔一些。不过笔者以为，外交因素对燕京大学

① 本文是笔者承担的北京联合大学中青年骨干教师资助计划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类)《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史》的部分成果。本文所述的基督教主要指新教。

② 艾德敷，美国人，1905 年硕士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906 年来到北京，是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创建人之一，20 世纪上半期长期居留中国，曾担任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副总干事和总干事、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华北区总干事、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代理总干事、燕京大学校董会董事和司库等职，1945 年离华返美，1949 年被普林斯顿大学授予荣誉哲学博士学位。

③ Dwight W. Edwards, *Yenching University*,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1959, Preface.

④ Philip West,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

失败的影响不宜过分强调,毕竟它还是属于外在的因素。1995 年,另一位美国学者哈里斯 (Marjorie Jean Harris) 对近代北京的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产生浓厚兴趣,以《美国的传教与中国的现实——对华北协和女子大学/燕京大学女部发展的跨文化影响的历史分析》(American Missions, Chinese Realities – An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Cross – Cultural Influence Upon the Development of North China Union Women’s College/ Yenching Women’s College 1905 – 1943) 为题完成了其博士论文。该文以近代北京也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女子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为中心,从跨文化的视角深入探究美国传教活动与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关系,主要侧重对该校几任女校长的分析。该文的选题富有新意,如作者本人所说,之前“尽管有一些学者研究传教史,但是无人深刻地考察过中国妇女的基督教教育”,这也是该文的特色之一。特色之二在于作者对文化传播的双向影响有着深刻的理解,比较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女传教士教育家们在帮助中国妇女接受高等教育以适应妇女生活不断变化的特征和中国政治环境的转变时,也使她们自己的生活、信仰和认知发生了改变”<sup>①</sup>。但作者对美国女传教士教育家的作用和影响也很高估。20 世纪末,留美中国学生邢文军以《社会福音、社会经济和基督教青年会——甘博和普林斯顿 – 北京中心》(Social Gospel, Social Economics and the YMCA: Sidney Gamble and Princeton – in – Peking) 为题撰写博士论文,详细考察了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研究干事美国人甘博和普林斯顿 – 北京中心在 20 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开展社会调查、社会服务和社会改革等活动及其影响。在作者看来,甘博和普林斯顿 – 北京中心的作用就在于“以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展现了西方和中国之间丰富的知识和文化的普遍互动——美国和中国之间特殊的互动”<sup>②</sup>。以一个与基督教青年会相关的人物和机构为切入点,深入探究美国青年参与基督教海外传教运动、将社会福音的改革精神带入中国并通过基督教青年会使社会福音影响北京,进而证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是可以和谐共存的,这是该文最大的特色。但作者对普林斯顿 – 北京中心在后期的活动介绍较少。

不难看出,在美国的学者涉猎近代北京基督教史研究较早,其研究对象也比较集中,在教会大学和基督教青年会等方面着力较多,而且多从近代中美关系、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入手,研究重点为与美国关系密切的人物和事件及其影响,其视角独特,分析深刻,但多为专题性研究,有关近代北京基督教史的综合研究很少。

## 2. 中国大陆的主要相关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近代北京基督教史的研究在中国大陆逐渐受到重视,较早开始这项工作的当推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理事王毓华,她于 1996 年完成编写的《北京基督教史简编》一书可说是奠基之作,该书收编了自 19 世纪中期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基督教(新教)在北京的很多史实和相关资料,其史料来源于各教会档案、出版物和《北京基督教史料选辑》,北京市政府的《专门登记》档案,个人口述或书面材料以及外国传教士的一些书籍<sup>③</sup>。该书所收史料多与教会宗教活动相关,作者对史料也做了一些梳理,但其史料多来自中文文献,英文档案较少收录,反映教会社会活动的内容很少。无论如何,该书所提供的文献信息十分珍贵,是学者从事北京基督教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参考书籍。学者对近代北京基督教史的专门研究始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陈月清和刘明翰两人合著的《北京基督教发展述略》为其代表,该书于 1998 年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对基督教三大宗派——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在北京的传播与发展进行了综合考察。基督教(新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以 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的基督教研究为主,其篇幅有限,对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的论述不够深入,对档案资料的利用不足,但该书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为后人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进入 21 世纪以后,有关近代北京基督教史的研究逐步深入,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包括《社会福音、社会服务与社会改造——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历史研究 1906 – 1949》、《基督教与近现代北京社会》、《北京地区基督教史迹研究》等专著和“历史·性别·社会:北京市基督教女子中学初考——以贝满女中为中心”等文章,研究不断向纵深拓展。《社会福音、社会服务与社会改造——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历史研究 1906 – 1949》一书主要以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为个案,深度描述和详细分析基督教青年会是如何进入中国 and 北京、如何将提倡社会服务与

① Marjorie Jean Harris, *American Missions, Chinese Realities – An 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Cross – Cultural Influence Upon the Development of North China Union Women’s College/ Yenching Women’s College 1905 – 1943*, A Ph. D Thesis of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1995, Abstract.

② Xin Wenjun, *Social Gospel, Social Economics and the YMCA: Sidney Gamble and Princeton – in – Peking*, A Ph. D Thesis of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1992, Abstract.

③ 王毓华《北京基督教史简编》,北京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北京市基督教教务委员会办公室印制,1996 年,第 2 – 3 页。

传播社会福音相结合、探索改造近代中国社会之路的。该书是国内第一部深入研究城市基督教青年会历史的学术专著,利用了大量的英文档案文献,对基督教青年会的源流、发展以及在近代北京的活动和影响深入探究,再现了20世纪上半期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历史,分析了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北京社会的互动<sup>①</sup>,对中国大陆的城市基督教青年会历史研究有一定带动作用。但由于史料所限,该书对抗战时期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在北平的活动介绍略显不足。《基督教与近现代北京社会》主要探究基督教(新教)从19世纪中期传入北京直到21世纪初的历史。该书的时间跨度约150年,其间又以1949年为界,分出近代和现代两大阶段,前者主要考察基督教在近代北京的传播及其相关活动和多方面的影响,后者重点探讨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以及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做的种种努力。该书的特别之处在于采用了较多的中文档案文献和期刊杂志,深度考察了一些名人与近代北京基督教的关系,对北京基督教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及相关问题进行了一些分析<sup>②</sup>。但有关新中国成立初期特别是文革时期北京基督教会的历史论述比较简略。《北京地区基督教史迹研究》运用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方法,以北京现存的基督教史迹和文物为对象考察其现状及历史。作者指出,历史上的北京发生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至今在地面和地下还保存着许多年代久远、种类丰富、价值很高的遗迹遗物,而基督教文物遗存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唤起人们对它们的抢救保护,使其有益于现代北京的社会文化发展<sup>③</sup>,其现实意义显而易见。该书所述的基督教包括了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甚至景教,时间从唐代到明清时期,近代基督教(新教)只是其中很小的部分,所占篇幅仅几页,对相关遗迹的介绍不足不详。“历史·性别·社会:北京市基督教女子中学初考——以贝满女中为中心”一文以近代北京的一所基督教会中学——贝满女中——为例,探究基督教中等教育的兴起、发展和影响以及其针对挑战的回应和面对机遇的努力,该文的特点在于从多角度入手和分析,如笔者所说“从历史语境、性别问题和社会参与这三个角度,来探讨基督教女子教育在北京地区的思想转型和社会变迁中的发展形态和历史意义”<sup>④</sup>,深化了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史的研究,但在相关档案资料的利用上还可以再挖掘。

综观上述成果,笔者对大陆学界有关近代北京基督教史的研究概括出如下一些特点:一是起步较早。基督教在近代北京的历史是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历史的一个缩影,近代北京基督教史是近代中国基督教区域史的组成部分,近代北京基督教史研究开始于改革开放初期,与同一时期其他区域的基督教史研究一起带动了中国基督教区域史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基督教区域史方兴未艾,研究成果陆续问世,较早的一批当属20世纪最后10年间出版的一批专著,包括陈友平、李少平的《基督教与福建民间社会》(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张坦的《“窄门”前的石门坎——基督教文化与川滇黔边苗族社会》(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姚民权的《上海基督教史》(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上海市基督教教务委员会,1994年)、陶飞亚、刘天路的《基督教与近代山东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莫法有的《温州基督教史》(香港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1998年)、钱宁的《基督教与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变迁》(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等,前面述及的《北京基督教史简编》和《北京基督教发展述略》也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二是研究范围逐步扩大、不断深入。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基督教区域史的研究不断向纵深推进,不仅总的研究成果增多,而且反映同一区域基督教研究成果的数量也多起来,例如,反映华南地区基督教的研究成果就有吴义雄的《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和《开端与进展:华南近代基督教史论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2007)、林金水的《福建基督教史初探》(台北宇宙光出版社,2006年)、郭德焱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与广州口岸》(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赵春晨等的《基督教与近代岭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等,而有关西南地区基督教研究的成果则有韩军学的《基督教与云南少数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昆明市宗教事务局编的《昆明基督教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5)、肖耀辉、刘鼎演的《云南基督教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秦和平的《基督教在四川传播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等,此外还有基督教在东部沿海城市的历史研究成果如龚纓晏的《浙江早期基督教史》(杭州出版社,2010)、孙顺华的《基督教传播与近代青岛社会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等,而

① 左芙蓉《社会福音、社会服务与社会改造——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历史研究1906-1949》,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绪论。

② 左芙蓉《基督教与近现代北京社会》,巴蜀书社,2009年,绪论与结语。

③ 吴梦麟、熊鹰《北京地区基督教史迹研究》,文物出版社,2010年。

④ 尹文涓《基督教与中国近代中等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46页。

关于北京地区基督教史的研究也出现同样的趋势,从前面述及的《社会福音、社会服务与社会改造——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历史研究 1906—1949》、《基督教与近现代北京社会》、《北京地区基督教史迹研究》等著述不难看出,有关近代北京基督教史研究既有总体性论述,也有专题讨论,既有对北京基督教历史的综合考察以及对基督教在近现代北京的传播、发展及影响的纵向研究,也有针对基督教青年会和教会中学等方面的个案考察,大大丰富了中国基督教区域史的研究。三是研究方法逐渐多元化。比较明显的是,学者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对于近代北京基督教史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是历史学的方法,以梳理史料和论述史实为主,后来逐步向跨学科研究方向发展,尝试运用历史学、宗教社会学以及性别学、考古学等方法,既注重史料的广泛收集和梳理,也重视基督教与近代北京社会互动的分析,还将视角转向基督教青年会以及女性与教会中等教育,反映了学者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研究思路逐渐扩大以及研究方法日益多元。四是研究范式的非单一性。改革开放以来,近代北京基督教史的研究范式总的来看具有非单一性,或者说是混合型的,学者们对不同阶段的史实、对不同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及其影响所采用的范式是有差别的,即具体事件和人物具体分析,既指出基督教传入近代北京的强权政治背景及其影响,也从世界文化复杂交流的大背景来分析判断基督教入华所带来的中西文化相遇、碰撞、互渗、沟通及其与北京近代化的关系<sup>①</sup>。因此,在同一著述中采用两种以上范式的情况并不少见。

需要指出的是,大陆学者对近代北京基督教史的研究总体来看也还存有一些遗憾,例如,由于史料挖掘不够,致使很多问题难以得到深入细致的剖析,现有研究成果也不能取得尽如人意的效果,还有不少相关领域因此被学者忽视。此外,学者多关注基督教与北京社会的关系,但对基督教会自身发展演变的历程少有专门深入的考察。另外,现有研究多史料梳理和史实分析,但对相关理论的深度阐释较少,更缺乏理论上的突破或创新。因此,该研究领域的外中学者加强交流、相互学习、彼此借鉴是很有必要的。

## 二、近代北京基督教史的相关资料及利用

详细占有史料是历史研究的最基本条件,同样,近代北京基督教史研究也离不开相关史料的利用。从保存来看,现有的相关资料主要在北京的各大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等)、各综合性大学(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图书馆、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基督教会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保存,港台和美国也存有一些。从内容来看,有关近代北京基督教史的资料很多,包括各类基督教报刊杂志、基督教会会议文件、基督教年鉴、教会会务活动记录、男女青年会的会刊和报告及纪念刊、教会学校刊物、相关人士回忆录、基督徒知识分子的论著以及普通报刊的相关报道等,非常丰富。其中基督教报刊杂志有《救世报》、《生命月刊》、《真理与生命》、《暗中之光》、《北平青年》、《华北公理联合月刊》、《中华基督教公理会联合月刊》、《灵食季刊》、《燕大团契声》、《燕京神学丛刊》、《恩友》、《团契》、《田家》、《紫晶》<sup>②</sup>等多种。基督教会会议文件、会务活动记录及年鉴等也有不少,如《基督教全国大会报告书》、《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干事大会报告书》、《华北基督教宗教工作研究会会刊》、《北京公理会会议记录》、《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会务纪闻》、《中华基督教会年鉴》、《华北宗教年鉴》等。相关报告和纪念刊有《北平基督教女青年会社会服务工作报告书》、青年会年度报告(英文)、《北平基督教女青年会三十周年纪念刊》、《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 1885—1935》等。教会学校刊物则包括了各校校刊以及一些名校如崇实中学、汇文中学、慕贞女校以及燕京大学等印制的年刊、纪念刊和报告书等。相关人士回忆录有《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燕京大学——1945—1951级校友纪念刊》、《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会史片断》、丁韪良的《花甲忆记》和《北京被围目击记》、刘廷芳和谢景升的“司徒雷登年谱”、陆志伟的“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等。此外,一批与近代北京基督教有关的基督徒知识分子的论著如吴雷川的《基督教与中国》、《基督教研究课程》,张钦士的《国内近十年来之宗教思潮》,徐宝谦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吴耀宗的《社会福音》、《大时代的宗教信仰》,赵紫宸的《从中国文化说到基督教》、《中国基督教教会改革的途径》等也是重要的参考资料。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的一些报刊如《大公报》、《晨报》等也经常刊登近代北京基督教的一些活动,不失为学者相关研究的辅助文献。从利用来看,目前利用率较高的近代北京基督教史文献有《生命月刊》、《真理与生命》、《华北公理联合月刊》以及北京基督教青年会英文档案等。其中,《生命月刊》是研究 20

① 卓新平《中国宗教学 30 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第 297 页。

② 该刊创办于 1931 年,会址在燕京大学燕南园内,刘廷芳任编辑,从第 4 卷第 2 期起,该刊的印刷及发行事务委托位于上海博物院路 19 号的广学会代办。

世纪二十年代基督徒知识分子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的重要依据之一,其内容广泛,涉及宗教教育讨论、圣经研究、神学研究、社会问题研究、教会问题研究以及基督教革新运动的提倡等,而且该刊各卷保存完整<sup>①</sup>,为大陆和港台学者较多地参考和引用。《真理与生命》以讨论中国教会问题、阐发基督教真理以促进中国基督教运动为宗旨,其发行时间自1926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抗战期间停办。该刊为民国后期基督教史和基督教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广受学者关注和利用。《华北公理联合月刊》(从第4期起又名《华北公理会月刊》)为传入中国的基督教宗派之一公理会所办刊物,刊址在北平,以报道华北地区公理会的活动为主,该刊近来也受到研究近代北京公理会史的学者重视。基督教青年会在民国时期的北京非常活跃,影响较大,但相关的史料在大陆保存很少,大陆学者对它的研究较多地依靠在美国保存的英文档案,但这些英文档案也多限于1937年以前,以后至1949年期间的档案文献存留至今的仍不多。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学者对近代北京基督教史料的利用经历了由稀少到逐渐增多的过程。由于文革等因素造成的相关史料散落或流失,加之改革开放初期很多相关档案不予开放,学者早期所做的相关研究可利用的史料很有限。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和深入、大陆与海外交流活动的增多以及一些历史档案的解封等,越来越多的历史文献向社会开放,地方志、教会档案、教会报刊以及其他相关文献和外文资料等为学者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支撑。但也有不少宗教期刊卷数不全、档案文献片面等,成为制约学术研究的不利因素,还有一些档案在大陆已经消失殆尽,而在海外保存较好,尽管获取它们存在交通方面的某些不便,但毕竟有希望获取,而且随着图文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广泛应用,一些在海外的档案文献也逐渐可以通过互联网在国内查阅,这对大陆学者来说无疑是福音。因此,从前述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的变化:早期研究所参阅的一手资料不多、外文资料较少,近期研究所利用的史料较为丰富,包括大量的中英文档案资料以及其他外文文献。但总的来看,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已经面世的研究成果对史料尤其是档案资料的利用仍不够充分。

### 三、对未来研究的展望与建议

由于近代北京基督教史在近代北京史、近代中国基督教史、近代中外关系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还由于近代北京基督教与当代北京基督教的承继关系,重视对它的研究很有必要,不仅有助于北京史研究领域的拓宽和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深入以及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丰富,而且对基督教的中国化与本土化、中国基督教的历史影响与现实作用等理论问题的探索也具有重要意义。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近代北京基督教史的综合性研究虽然比较广泛但仍然不够全面,有些问题虽然涉及但没有得到充分论述,而专题研究仅局限于个别议题,很多领域有待开拓。以笔者之见,今后还需要重视以下五个方面的专门研究。一是近代北京基督教会的历史,包括各宗派、教派或教会的演变、组织结构、成员构成及宗教活动等。近代北京基督教宗派林立,门户众多,既有外来的宗派如伦敦布道会、长老会、圣公会、卫理公会、公理会、神召会、救世军、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圣洁教会、圣经会等,也有自办的教派或教会如真耶稣教会、圣城新教会、基督徒会堂、基督徒聚会处及一些福音堂等,有关它们的专门深入研究至今几乎是空白。二是近代北京基督教神学教育,包括各类神学院校的开办及宗旨、课程设置、师生来源、毕业生流向及影响等方面。基督教神学院校在近代北京有很多,包括华北协和道学院、汇文大学校神科、燕京大学宗教学院、联合女子圣道学院、北京神学院、真理学院、北平圣书学院、基督教灵修院、香山灵修学院等,不仅培养了一批中国传道人,而且涌现出一批中国基督教教育家和神学思想家,他们曾对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体系的构建做出过重要贡献,赵紫宸、刘廷芳、吴雷川等是其代表人物。总的来看,有关近代北京基督教神学教育的现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与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相关的人和事方面,对其他神学院校及相关人物的深入研究极少。三是教会附属机构如学校、医院、出版社、图书馆、慈善组织等。一般而言,学界对近代北京的教会大学关注较多,但对教会中学和小学较少专门研究。事实上,教会初级和中级教育是教会高等教育的基础,以1865年裨治文夫人开办的贝满女子小学为例,后来的贝满女中和华北协和女子大学(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后并入燕京大学)都要寻根到这里。此外,近代北京的一些教会中学在今天仍然存在,如育英中学(现为北京市立25中)、汇文中学和潞河中学等校的地址没有改变,有的甚至校名依旧,如汇文中学(一度改名为市立26中)和潞河中学(一度改名为通县1中)等,其历史影响由此可见,加强对它们的研究有助于理解近代北京的教育近代化。此外,有关近代北京教会医院的历史至今仍缺少有分量的专门研究成果。近代北京最早的西医院和西医学校是由伦敦

<sup>①</sup> 自1920至1926年,《生命月刊》共出版6卷56期。

布道会开办的，今天的协和医院和协和医科大学的历史都要从此开始；北京同仁医院也曾是教会医院，初名美以美会医院，1886 年由美以美会在崇文门内孝顺胡同创办，1903 年扩建后取名同仁医院，以眼科见长。上述医院在今天仍然闻名全国，这与其传统因素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关于近代北京基督教出版机构、图书馆、慈善组织等专门研究也基本上处于边缘地位。四是相关方面。例如，近代北京基督教与其它宗教的关系、与全国各地基督教的关系、与中外名人的关系等。近代北京有很多宗教并存，主要有佛教、道教、回教、天主教，还有民间宗教，基督教与它们的关系如何？有无对话？等等，这些问题至今没有受到学者的重视，少有深入专门的研究成果。近代北京长期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吸引并聚集过很多名人，他们与近代北京基督教关系密切。例如，有着“基督将军”称号的冯玉祥就曾与近代北京基督教会来往频繁，他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是在北京的亚斯立教堂<sup>①</sup>，他曾在北京发起成立“基督徒祈祷会”，其夫人李德全曾是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干事。又例如，当代北京著名作家老舍早年曾在北京西城缸瓦市教堂接受基督教洗礼，并且参与缸瓦市教堂的自立自养，起草《北京缸瓦市中华基督教会现行规约》。名人与近代北京基督的关系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基督教的广泛影响，这一研究有待深入。五是 1937 - 1949 年期间北京基督教的历史，特别是抗战时期的北京基督教史。1937 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平较早沦陷。在日伪统治下，基督教会面临严峻考验，虽然在抗战前期，基督教因为与英美的密切关系，属英美差会的各教会仍然在英美传教士和外国经济的支持下照常活动，但是大环境的改变还是令其发展严重受挫，尤其是珍珠港事件爆发后英美对日宣战，一些传教士包括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等人被日本人拘留。为监视、利用和控制基督教会，日本在北平组织华北基督教团，迫使教会参加，否则予以解散；燕京大学被迫关闭，一部分师生逃往中国西南地区复校……基督教会及其相关组织面临非常艰难的境地。另一方面，广大基督徒坚决反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尽其所能、竭尽全力以不同形式参与抗日救亡，例如，服务抗日将士和伤兵、救济贫民难民、多方募集钱物为抗战出力等等。抗战胜利后，基督教会进入重建和奋进阶段，战后提出的“三年计划”希望教会在 1946 至 1949 年中不但可以重建而且有所发展。实现这一计划的运动名“三年奋进运动”，其目标是增加信徒的人数、加强教会力量以使教会富有生命力、促使教会合一与合作、提高社区和国家的精神生活。这一运动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反映在信徒人数增加，堂会数量增多，一些外国传教士再度进入北平，福音传播、文字宣教等活动急速发展，燕京大学回迁北平，各神学院校复校开学等方面。另一方面，战后时局动荡，内战再起，信徒的社会责任感增强，教会领袖对时局的主张及对国民党政府的认识分歧加大，一部分教会人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三自爱国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大陆学界目前对这段历史的深入研究极少，相关史料缺失较多、存在一些敏感问题等是重要原因。

从现有研究方法来看，专家学者对近代北京基督教史的研究多采用历史学、兼用宗教社会学、考古学和性别学的一些方法，但从神学、历史文献学、文化遗产学等角度深化研究的不多。事实上，基督教在近代北京的传播过程中，基督教神学思想也得到丰富发展，系统深入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基督教的中国化与本土化以及一些相关问题。此外，有关近代北京基督教史的文献资料十分丰富但又比较分散，包括中文和外文的资料，对它们加以系统地收集整理和编译出版不仅有利于学者的研究而且有助于历史文献的保护。从文化遗产学的角度看，近代北京基督教文化及相关遗址、遗迹和遗存也是北京文化遗产的一部分，重视对它们的利用、保护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对推动北京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四、结 语

把近代北京基督教史放到中国基督教史的发展历程中看，说它太短暂绝不为过，然而，这并没有成为中外学人忽视它的理由，相反，它却成为吸引学者的因素之一，因为它的影响度与它的时间段并不成正比。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开始的美国学者对教会大学及青年会的专门研究到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学者对基督教的综合性研究及某些专题研究不难看出，它对学者的吸引力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反倒还有增加的趋势。近代北京基督教史的研究现状一方面反映了中外学人的不懈努力及取得的成绩，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不足和遗憾，足资日后研究借鉴。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回顾和分析中外学人对近代北京基督教史的研究现状、介绍和梳理相关历史文献，不仅有利于学术界的沟通与交流，也有助于相关研究水平的不断提升，对深刻理解北京基督教从传统向现

---

① 该教堂现名崇文门教堂，它是北京现存历史悠久的新教教堂，也是一所涉外教堂，接待过不少的外宾。每个主日都有外国使馆的官员、国外信徒来此做礼拜。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和克林顿曾专门到该堂做礼拜，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乔治·凯瑞博士、著名布道家葛培理牧师曾经多次来访。

代的转变及其原因也有一定的启发性。

(作者左芙蓉,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 《子藏·道家部·庄子卷》出版

陈志平

《庄子》是先秦子书之一,其不羁的构想、深邃的思想、优美的语言吸引了无数的爱好者。文人、哲士、道士、僧人均曾沉浸浓郁、含英咀华于其中,故《庄子》不仅是重要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著作,也是重要的宗教著作。自魏晋南北朝以降,《庄子》与本土之道教、外来之佛教关系密切。概而言之,大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道士、佛教徒对《庄子》思想的认可和阐发,进而以《庄子》思想与本教思想相互印证;二是道教径直以《庄子》为本教经典。

魏晋南北朝时期,庄子逐渐为道教认可,一批道教学者积极研究、阐发庄子思想。如东晋葛洪《抱朴子》将《庄子·逍遥游》中的理想人格“至人”、“神人”、“圣人”增饰成腾空游空、分身隐形的道教神仙,将哲学之“道”阐发为宗教信仰的“道”。南朝梁陶弘景则仿《庄子》内篇体例撰《真诰》七篇。蒙文通说“自魏晋而后,《老》、《庄》诸书入道教,后之道教徒莫不宗之,而为道教哲学精义所在,又安可舍《老》、《庄》而言道教?”<sup>①</sup>虽道教以《庄子》为经典的具体时间已无从考证,但隋代道士所讲经典中就有《庄子》<sup>②</sup>。唐代,随着老子崇拜的狂热兴起,庄子的地位也逐步提升。开元二十九年,“始置崇玄学,习《老子》、《庄子》、《文子》、《列子》,亦曰道举。其生,京、都各百人,诸州无常员。官秩、荫第同国子,举送、课试如明经”(《新唐书·选举志》)“天宝元年,诏号《庄子》为《南华真经》,《列子》为《冲虚真经》,《文子》为《通玄真经》,《亢桑子》为《洞灵真经》。”(《新唐书·选举志》)故至后世,《庄子》入《道藏》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道教从庄子中吸收营养的同时,佛教也依托庄子寻求生存发展。他们往往以佛教教义攀附老、庄学说,对庄子思想进行阐发和化用。如东晋僧肇经常借助庄子的语言和思想来发挥龙树般若中观学说,时人称之“每以《庄》、《老》为心要”<sup>③</sup>。此种格义、连类,颇似“旧瓶装新酒”,成功推进了佛教在中国士大夫间的传播。同时,亦有如支遁者,以《道行经》、《般若波罗蜜》意旨解释庄子《逍遥游》,深化了对庄子思想的理解。后世佛子多承此二路径,或以庄解佛,或以佛解庄。著名者如明代释性通《南华发覆》、释德清《庄子内篇注》、清代觉浪道盛的《庄子提要》、净挺的《漆园指通》。甚者以《庄子》为沟通释、道之桥梁,如南朝梁沙门智棱“善《涅槃》、《净名》,尤通庄、老”,还俗后又为道士。<sup>④</sup>至明代陆西星《南华真经副墨》,以道教丹书、佛经一同印证《庄子》,开创了解庄的新路径。

无论道士还是佛子,均曾经以《庄子》为重要思想资源,而在对历代《庄子》研究、阐发的梳理中,亦能看出道教、佛教发展的内在脉络。故不仅治文学、思想、哲学者要研究《庄子》,治道教、佛教者一样要研究《庄子》,而治诸史者更当留心于庄学之发展史。如能汇历代《庄子》研究著作于一编,省学者奔波搜罗之苦,重现两千年庄学之发展,必大有功于学界和宗教界。

上世纪60年代,台湾严灵峰先生曾纂辑影印《庄子集成》初编、续编和《老列庄三子集成补编》。限于历史原因,两岸阻隔,交流不便,严氏于大陆所藏之善本、手稿多未寓目;加之受印刷技术限制,影印效果也差强人意。2011年11月,《子藏·道家部·庄子卷》由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相较于严氏《庄子集成》“三编”,《子藏·道家部·庄子卷》收书数量大大增加,甄选版本更加精良,影印质量也大幅提高,可谓“后出转精”。

① 《道教史谈》,《中国哲学》第四辑,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版。

② 《隋书·经籍志》:“大业中,道士以术进者甚众。其所以讲经,由以《老子》为本,次讲《庄子》及《灵宝》、《升玄》之属。”

③ 《高僧传》卷六《释僧肇传》。

④ 《佛祖统纪》卷三七引《僧镜录》。